

# 中国地方重复建设的内在机制研究

皮建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 重复建设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虽然重复建设几乎无法从国际主流经济学文献中检索出来, 但是这并不妨碍国内学者对重复建设的定义达成共识。魏后凯认为, 重复建设是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数量过多造成全国总体产能过剩、生产设备闲置的现象。<sup>[1]</sup> 因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 所以重复建设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产业表现形式。探讨重复建设的根本性成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只有在了解了根本性成因以后我们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在重复建设的成因上, 目前主要有5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从财政激励的角度进行的, 这种解释认为财政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投资那些看起来有利可图的产业, 并对投资后的产业进行地方保护。<sup>[2]</sup> 第二种解释是从晋升激励的角度进行的, 这种解释认为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晋升激励使得地方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 这就形成了地方保护和重复建设的制度基础。<sup>[3]</sup> 第三种解释是从预算软约束的角度进行的, 这种解释认为地方政府进行的投资或地方政府干预企业进行的投资并没有顾及项目的风险和成本。<sup>[4]</sup> 第四种解释是从产权制度的角度进行的, 这种解释认为国有企业对控制权丧失缺乏必要的补偿, 政府部门或企业管理者为

了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会对并购等重组行为进行极力抵制, 这样就形成了重复建设的产权基础。<sup>[5]</sup> 第五种解释是从羊群行为的角度出发的, 这种解释认为地方政府的风险规避倾向使得晋升激励下的地方官员选择了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的行为。<sup>[6]</sup> 所有5种解释在逻辑上都能自圆其说, 但在现实解释力和政策含义上则有所不同。

笔者的解释跟传统的5种解释在视角上存在明显的不同。笔者认为, 中国重复建设的根本性原因是两个地区的先进部门(比如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差距太小以及宏观经济环境中存在的初级产品的价格扭曲。笔者的解释跟林毅夫和刘培林<sup>[14]</sup>的解释在思想上一脉相承。要认识清楚中国的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 就必须认识清楚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 在纠正发展战略上的扭曲和经济布局上的扭曲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而中国的重复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问题的表现。笔者认为, 从历史逻辑和体制变迁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的重复建设更能认清事物的本质。

## 一、基本模型

在这一部分, 笔者将对中国的重复建设进行模

[收稿日期] 2007-12-25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70420008)

[作者简介] 皮建才(1977-), 男, 山东临沂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 经济学博士。

型分析。本文假设存在两个地区,一个是发达地区,一个是落后地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都可以用初级产品(用 $F$ 表示)和生产制造品(用 $M$ 表示),但发达地区生产制造品的生产率(用 $A$ 表示)比落后地区生产制造品的生产率(用 $A^*$ 表示)更高,即 $A > A^*$ 。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都可以生产初级产品,但落后地区生产初级产品的生产率(用 $a^*$ 表示)比发达地区生产初级产品的生产率(用 $a$ 表示)更高,即 $a^* > a$ 。因为本文不需要进行动态分析,也不需要考虑制造品部门的干中学效应,所以可以假定 $a^*$ ,  $a$ ,  $A^*$ ,  $A$ 四个代表生产率或技术水平的参数对时间的导数等于零,即它们都不随时间发生变化。为了分析方便,本文再假设两个地区拥有相同的劳动力数量,都是 $L=1$ 。在分析的过程中凡是上标带星号\*的都表示落后地区。

遵循陆铭等人<sup>[7]</sup>以及德梅特和奥尔廷(Desmet and Ortin)<sup>[8]</sup>的研究,笔者假设生产函数是线性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初级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Q_F = aL_F \quad (1)$$

$$Q_F^* = a^* L_F^* \quad (2)$$

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制造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Q_M = AL_M \quad (3)$$

$$Q_M^* = A^* L_M^* \quad (4)$$

笔者假设两个地区的居民都有相同的效用函数:

$$U(C_M, C_F) = C_M^\mu C_F^{1-\mu} \quad (5)$$

式中, $C_M$ 是制造品的消费量; $C_F$ 是初级品的消费量。笔者假定 $0 < \mu < 1$ ,同时假定初级产品的价格是 $p_F$ ,制造品的价格是 $P_M$ 。

根据式(5),通过最大化收入约束下的效用函数可以得到:

$$\frac{C_M}{C_F} = \frac{\mu}{1-\mu} \times \frac{p_F}{p_M} \quad (6)$$

#### (一) 独立自主时的情形

当两个地区独立自主时,为了最大化自身的效用,不管哪个地区都会把 $\mu$ 比例的劳动力分配于制造品所在的产业,把 $1-\mu$ 比例的劳动力分配于初

级产品所在的产业。

这样一来,对发达地区而言,初级产品和制造品的产量分别为:

$$Q_F^{\text{独}} = (1-\mu)a \quad (7)$$

$$Q_M^{\text{独}} = \mu A \quad (8)$$

对落后地区而言,初级产品和制造品的产量分别为:

$$Q_F^{*\text{独}} = (1-\mu)a^* \quad (9)$$

$$Q_M^{*\text{独}} = \mu A^* \quad (10)$$

因为落后地区在初级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比较优势,发达地区在制造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比较优势,所以分工看起来应该更加有利可图,但实际上要依 $\mu$ 的大小而定。

完全分工时初级产品和制造品的总产量分别为:

$$Q_F^{\text{总}} = a^* \quad (11)$$

$$Q_M^{\text{总}} = A \quad (12)$$

要想使得完全分工更加有利可图,必须使以下两个不等式同时成立:

$$Q_F^{\text{总}} > Q_F^{\text{独}} + Q_F^{*\text{独}} \quad (13)$$

$$Q_M^{\text{总}} > Q_M^{\text{独}} + Q_M^{*\text{独}} \quad (14)$$

由式(13)和式(14)可以解出 $\mu$ 的大小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使得完全分工有利可图:

$$\frac{a}{a+a^*} < \mu < \frac{A}{A+A^*} \quad (15)$$

#### (二) 自由市场时的情形

当初级产品的价格 $p_F$ 和制造品的价格 $p_M$ 没有被人为扭曲时,两个地区通过合理的分工可以获得更大的效用。

在完全自由市场时,完全分工将是有利可图的,考虑到消费量等于产出量,把式(11)和式(12)代入式(6),可以得到一个均衡结果:

$$\frac{p_M}{p_F} = \frac{\mu a^*}{(1-\mu)A} \quad (16)$$

要想使得落后地区没有激励偏离这个均衡,必须使得落后地区生产初级产品得到的收益大于生产制造品得到的收益,即:

$$p_M A^* < p_F a^* \quad (17)$$

把式(16)代入式(17)式,经过整理后可以得到:

$$\frac{A^*}{A} < \frac{1-\mu}{\mu} \quad (18)$$

只有当式 (18) 成立时, 也就是落后地区的生产制造品的技术比发达地区生产制造品的技术落后很多时, 落后地区才没有激励生产制造品。

对式 (18) 进行反转可以得到市场性重复建设存在的条件:

$$\frac{A^*}{A} > \frac{1-\mu}{\mu} \quad (19)$$

命题 1: 只要式 (19) 成立, 也就是落后地区的生产制造品的技术比发达地区生产制造品的技术落后不是太多, 就会存在市场性重复建设。

命题 1 就是本文求得的市场性重复建设存在的条件。中国之所以存在市场性重复建设, 就是因为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并不是太大。这可能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布局可能导致了落后地区在许多技术上并不落后; 第二个原因就是落后地区通过招商引资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黄亚生的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布局上非常分散。<sup>[9]</sup> 笔者认为, 这种分散跟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扭曲的工业布局有关, 扭曲使得地方保护和重复建设更容易发生, 因为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并没有大到使落后地区没有激励生产制造品。并且, 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条件下, 落后地区更容易发生重复建设问题, 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就可以直接提高落后地区的技术水平。

### (三) 价格扭曲时的情形

由于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 所以在转型的过程中许多价格都是扭曲的。一般来讲, 制造品的价格并没有扭曲, 但是初级产品的价格却被低估了。笔者假定初级产品的价格  $p_F$  被扭曲为  $\alpha p_F$ , 其中  $0 < \alpha < 1$ 。  $\alpha$  代表价格扭曲程度,  $\alpha$  越小表明价格扭曲程度越严重。尽管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以价格体系为中心的宏观环境是扭曲的, 但是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alpha$  会越来越大, 价格扭曲的程度会越来越轻。

这样一来, 式 (17) 就会变为:

$$p_M A^* < \alpha p_F A^* \quad (20)$$

把式 (16) 代入式 (20), 经过整理后可以得到:

$$\frac{A^*}{A} < \frac{\alpha (1-\mu)}{\mu} \quad (21)$$

式 (21) 不存在行政性重复建设的条件。即存在价格扭曲, 只要扭曲的程度不是很严重, 也有可能不会改变落后地区完全生产初级产品的激励。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价格扭曲都会导致重复建设。

对式 (21) 进行反转可以得到行政性重复建设存在的条件:

$$\frac{A^*}{A} > \frac{\alpha (1-\mu)}{\mu} \quad (22)$$

命题 2: 只要式 (19) 不成立但式 (22) 成立, 就会存在行政性重复建设。

价格扭曲是产生行政性重复建设的根源。当落后地区生产的初级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时, 发达地区的经济越是发展, 从落后地区获得的隐性补贴就会越多, 发达地区跟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就会越来越大。要想消除行政性重复建设, 就必须消除价格扭曲, 就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使得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性。只要落后地区能够从初级产品的生产中获得应得的回报, 并且这个回报大于其生产制造品时的回报, 落后地区就没有激励偏离完全分工的均衡结果。随着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 落后地区的要素禀赋会逐渐提升, 其产业也会进行相应的升级, 落后地区会逐渐向发达地区收敛。

命题 1 和命题 2 都表明, 重复建设实际上是一种资本的趋利行为, 对重复建设一味地进行批评和指责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要认识到重复建设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消除发展战略扭曲和工业布局扭曲而付出的代价。

## 二、结 语

本文的模型得到的结果跟传统文献的 5 种解释有很大的不同, 跟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的是互补的, 有的是竞争的, 存在互补关系时可以同时对, 存在竞争关系时不可能同时对。财政激励视角的解释存

在的缺陷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价格扭曲,如果没有这些价格扭曲,不进行重复建设而是进行完全分工可能更加有利可图。晋升激励视角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如果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非常大的话,地方政府通过完全分工可能会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预算软约束视角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体制变迁的历史过程,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地方分权经济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效率改进的过程。产权制度视角的解释跟预算软约束视角的解释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体制变迁的动态过程,从长期来看,政府只会支持那些能够带来正收益的项目,并采用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安排。羊群行为视角的解释实际上是晋升激励视角的解释的补充和扩展,这种解释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地方之间的技术差距。当然,笔者的解释可能也会存在视角上的缺陷,但是笔者的视角无疑跟传统的5个视角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且笔者的视角确实揭示了跟传统视角不一样的理论含义和政策含义,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

之处。

在政策建议上,各种视角的解释给出的答案也不尽一样。财政激励视角的解释在政策建议上更注重于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分税制、规范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晋升激励视角的解释在政策建议上更侧重于改革传统政绩考核体系、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预算软约束视角的解释在政策建议上更加强调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完善银行资金管理制度。产权制度视角的解释在政策建议上更注重于改革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羊群行为视角的解释在政策建议上跟晋升激励视角的解释一样更侧重于使地方政府从发展功能转向服务功能。本文的解释在政策建议上着重于两点:对市场性重复建设而言,中央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是提供和发布相关的产业政策信息,使得落后地区对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地区的落后水平有更好的了解,防止由于缺乏信息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对行政性重复建设而言,中央政府应该推动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体制改革,让价格确实反映相对稀缺程度,形成良性互动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 参考文献

- [1] 魏后凯. 从重复建设走向有序竞争——中国工业重复建设与跨地区资产重组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2] 沈立人, 戴国晨. 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 [J]. 经济研究, 1990, (3).
- [3]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J]. 经济研究, 2004, (6).
- [4] 周民良. 不合理重复建设的形成机制与治理途径 [J]. 改革, 2000, (5).
- [5] 张维迎. 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 [J]. 经济研究, 1998, (7).
- [6] 张晔, 刘志彪. 产业趋同: 地方官员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J]. 经济学家, 2005, (6).
- [7] 陆铭, 陈钊, 杨真真. 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收益递增、策略性行为 and 分工的效率损失 [J]. 经济学 (季刊), 2007, 6 (2).
- [8] K. Demset, I. O. Ortin. Rational Underdevelopment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09 (1): 1-24.
- [9] 黄亚生.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杨万东)